

王五平詩選



王 亞 平 詩 選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· 北 京

書號 14

字數 77000

王亞平詩選

著者 王 亞 平

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

京 1-20000
定價 5.400 元

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序

我生長在河北省南部的大平原上，那裏有一馬平川的原野，有紅色的奔流的黃河，有綠樹土房的村莊，村莊裏住着勤勞、勇敢的農民。我在童年的時候，每當星月照亮了場園的夏天，北風吹打着紙窗的冬夜，慈祥而健談的老祖母常給我講神話、傳說、故事。那些人民口頭文學中的人物，給予我永遠難以磨滅的印象。有時，麥天已過、秋收已完的農閒時期，村裏請來了能說善唱的藝人，說“三國”，講“水滸”，唱民間曲調，我常常聽得入耳動心，眉飛色舞，心靈裏對他們充滿了崇敬和感激。

我的故鄉是美麗的，正如我在“都市的冬”序詩裏所寫的：“家鄉是一幅美畫，綠色田園笑對着

晴天。”可是，當我長到十五歲的時候，這個詩一樣的地方，在我眼睛裏改變了。我看見的是飢餓的人羣，流徙的農民，凍死在道旁的婦女，丟棄在街頭嬰兒，插上草標到市上出賣的兒童，餓得要發瘋的窮人在搶奪食物，不能再忍受苛捐雜稅、天災人禍的農民用大刀、土槍攻打黑暗的官府……這血淋淋的現實，圍繞着我，刺激着我，鞭打着我，在我純潔的心靈裏刻上了深深的烙印。我無論走到哪裏，都不能忘掉這些情景。我以後寫的許多詩，也都是以這時的生活實感做基礎創作出來的。

在農村走向破產、窮困的過程中，我的家，很快地由中農降到了貧農，地賣了，牛被地主牽走了，愛講故事的老祖母中霍亂死了，辛苦一生、忠實耿直的老祖父倒在牛槽前邊停止了最後的呼吸。最使我痛恨的是這樣一件事：惡霸地主尙春子企圖霸佔我家種着菜蔬的小園子，我們提出正確理由向他抗議，他却勾結黑暗官府，用裁賊的卑劣手段，企圖坑害我全家的人。那時不得已，只有忍恨屈服。管事人帶我攜着點心、酒肉到尙春子家“陪禮”，他却用鼻子哼着說：“以後學老實些，如

果再冒犯我，小心你們的性命！”我回來當着父母痛哭了一場。我的心靈深處，種下了仇恨的種子，這顆種子，後來在黨的灌溉、培育下，成了向統治階級復仇的怒火。

我開始學習寫詩，是在邢台師範讀書的時候。那時，正是五四運動以後—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前。我和六位同學組織了一個“文藝研究社”，抱着想成詩人、作家的幻想，開始練習創作。不少傑出的作家如魯迅、郭沫若等人的作品，在當時啓發、教育、鼓舞着我們。我一年之間，就學寫了幾十首小詩。我興高采烈地向各地報章雜誌投稿，一篇一篇地都給退回來了。當時，我心裏痛苦、失望，睡不好覺，吃不下飯去。接着，學校便鬧起學潮，軍閥王承斌從學校驅逐走我們。我即走回家鄉，和朋友們創辦了“友聲”油印小刊物。因為這個小刊物，我們又被惡霸劣紳控為“宣傳赤化”，三個友人因此而入獄，我被通緝，就逃亡到都市。那一顆復仇的種子，在我心裏更增長了！

我這個從農村被逼走的青年，一旦跨進都市

的門檻，什麼東西對我都是陌生的。找不到幫助我的人，找不到安定的職業，從正定到開封、北京、天津、塘沽……彷彿什麼地方都留不下我。“把足跡寄託給大地，讓患難撕去了光陰”正是寫出了我那時的心情。“九·一八”事變發生了，我親眼看見滿載着難民的列車從東北開來，塘沽車站日本兵在站崗，喪權辱國的“何梅協定”在發散着香檳酒氣息的列車上簽訂。這些慘痛的現實，激起了我的仇恨心與愛國熱情。“孩子的疑問”、“大沽口”等詩都是這時候寫成的。

“九·一八”、“一·二八”的砲聲，喚醒了中國人民，喚醒了多少愛國青年，也喚醒了我。這時候，我接近了黨的地下工作者和進步的青年，到上海後又認識了中國詩歌會的蒲風、柳倩、穆木天等同志，回到北京，我和袁勃等創辦了“紫薇星”、“新詩歌”。不久，詩刊被查封了，京津住不下去了，就又逃奔到青島。在那個海風吹拂綠樹紅房的都市裏，我住了三年（中間因“一二·九”運動到過一次北京），認識了詩人王統照、臧克家等，我們結成了深厚的友誼。

這時候，我自己意識到，應該作一個“燈塔守者”，“在這曙色欲來的前夜，我把生命獻給了光明。”正代表着我那時的思想情況。在詩歌創作上，也有了一個很大的轉機，我深切地認識到：詩是最難寫好的，要想藝術上有成就，須有個長期艱苦的學習過程。於是，我努力讀中外名著，特別對杜甫、白居易、普希金、拜倫的詩發生了濃厚的興趣，精細地閱讀他們的作品，使我寫詩的技巧有了很大的改進。另外，我又常常收集民歌、民謠，還把人民大眾的語言用小本子記錄下來，用來豐富我創作的藝術。三年間，我寫成了“都市的冬”、“海燕的歌”、“十二月的風”(長詩)三冊詩集，這裏所選的第一輯詩，都是這時期的作品。從家鄉流浪到都市，前後有十年的光景，我認真地生活着，為祖國盡了一點戰鬥的力量。這些詩正是生活與戰鬥的火花。

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了，那時我正在東京，剛寫成了“地獄”初稿(此稿在戰爭中遺失了)，聽到這震撼人心的消息後，我馬上回到了上海。

那時，多少青年和愛國人士，在黨和祖國的號召下，激起了最大的愛國熱情，準備爲抗日犧牲一切。我自己也抱着“把此身獻給火線喲，用生命換取血寫的詩篇”的志願，參加了錢亦石同志領導的戰地服務隊，投進抗日鬥爭的洪流。

我們參加了浦東、馬迴嶺的戰鬥，走遍了江、浙、鄂、湘、贛五省的土地，常常冒着日寇飛機的轟炸、砲火的襲擊，夜裏行軍，白天向軍民宣傳抗戰。我們一同生活，一同工作，一同戰鬥，使我開始感到了同志的愛，感到了只有爲人民而戰鬥生命才有價值，只有自己成爲一個人民戰士的時候才能寫出好詩，才能成爲一個人民的詩人。我和別的同志一樣，唱歌、演戲、寫壁報、塗標語……從來不感到疲倦，不想到自己的危險。爲了使自己的作品更能起到宣傳抗日的效果，我寫了不少短歌、小調、通俗體的詩。不管那些東西多麼粗糙，缺乏藝術性，但在當時確實起了一些鼓舞士氣、動員農民參加抗日的作用。

一九三九年冬天，我到了兩江合流、煙霧瀰漫的山城——重慶。生活略微安定些，那些在戰地

感受到的戰鬥的情景，戰士的形象，都潮水似地湧到我的腦海裏來，佔據了我的思想，激盪着我的感情，促使我必須把它們用詩表現出來。這些人物中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戰士王阿泥。他本來是一個忠實、勤勞的農民，正像我童年時代在故鄉所看到的那種農民一樣。他的身體結實，大眼睛，濃眉毛。你交給他什麼任務，他也像種田插秧一樣，一定不打折扣地完成。這樣的性格是可愛的，這樣的人物有千千萬萬，他雖說沒有受過什麼政治教育，但是他的家鄉的被敵人佔據，父母親人的離散，就會使他不但參加了抗日戰爭，而且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險去消滅敵人。從這個士兵身上，使我認識到了什麼叫人物性格，什麼叫藝術典型。王阿泥的形象，在我思想裏站立起來了，我是有意地用了比較通俗、明朗、順口的語言來表現他。這該是我愛聽口頭文學，記錄民歌，以樸素的、人民易懂的語言學習寫詩的一個起點，從風格上來說，也算是有了一點發展吧。另外，還寫了不少戰地即景、描寫戰鬥場面、表現戰地生活的詩，因為在思想裏沒有醞釀成熟，感情不够飽滿，語言、技巧

又太差，大都沒有寫好。

皖南事變以後，蔣匪幫反共親日的醜惡面貌暴露在全國人民面前了。居住在重慶的人民，受着更深重的痛苦。不少革命的作家、詩人、畫家、音樂家都紛紛走向延安。留下來的先進作家、革命青年、民主人士，在黨的領導下，和殘酷的統治者作着堅決不屈的鬥爭。這時期，我在精神上感到了很大的壓抑，在生活上感到了不少的困苦，眼望着重慶變成了非人的世界，大隧道慘案、較場口事件接連發生了，有正義感的人士隨時都可以失蹤，使我進一步認識到蔣匪幫正是代表向春子那些惡霸地主利益的，作為一個詩人的我，應該首先向這些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者復仇。我用輕便、靈活、短小的形式，寫了如“火霧”一類的暴露統治者黑暗、醜惡的小詩。

我雖說居住在重慶，心裏却仰望着延安，懷念着美麗的黃河大平原，嚮往着那些戰鬥着的故鄉父老，於是我寫了“向日葵”、“向黃河”、“中國，母親的土地呵！”等詩。在進行創作的同時，我讀了不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，毛主席的輝煌著作，

特別是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”的發表，像太陽一樣地照耀了文藝的領域，雖然在祕密的閱讀中，不能深刻領會它的精神，但是在明確工農兵的方向這個指導上，對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。同時，我又比較認真地閱讀了“杜甫全集”及“元曲”，使我在思想上、藝術上有了顯著的提高。從創作風格上來看，我同樣受了翻譯詩的影響，但基本上是沿襲着我自己所喜愛的接近人民口語的形式來努力的，縱然收穫很微薄，我却堅持了這個創作方向。這裏所選的“塑像”，從表現方法就可以看出比“血的斗笠”更接近了民族形式。

一九四六年秋天，我離開了多霧的山城，經南京，往開封，渡過了波浪滾滾的黃河，回到了冀魯豫大平原——我闊別了十四年的故鄉。這時候，能有什麼樣適當的文字、聲音，足以描寫出、歌唱出我愉快的心情呢？我重新看到了那親愛的土地，美好的田園，綠樹土房的村莊，走在黃土道上的大車、黃牛……這一切都富有新的意義，展現出新的景象。我心裏感激着，讚頌着：親愛的黨呵！偉大

的毛澤東同志呵！你領導着中國的工人、農民把土地從日寇及反動統治者手裏解放出來了！

我跟隨着有工作經驗的同志，戰無不勝的人民子弟兵，千百萬農民弟兄，立刻投入了火熱的戰鬥。這時候，蔣匪的新五軍還盤踞在黃河兩岸，那些可恨的特務、還鄉地主正作着各種造謠、破壞的反革命活動。我們每時每刻都在準備着，警惕着，工作着。只有從這個時候起，我才真正意識到我的創作、工作和無產階級事業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了。我們團結起當地的作家、文藝青年、能說唱的藝人、民間畫家等，成立了冀魯豫文聯，創刊了通俗刊物“新地”、“平原文藝”，出刊了“平原畫刊”，用了一切方式方法，向廣大羣衆進行宣傳活動。

使我得到更大鍛鍊、更多教育的是參加了土地改革鬥爭、反蔣守堤鬥爭。那些勤勞、樸實、智慧、勇敢的農民，幫助我豐富了生產知識、鬥爭知識。我看到黃河上的人民，在三百里的長堤上，懸起了紅色的燈籠，自動地守護着不馴服的河水和分得的土地；我看到冀南的農民，用小車推着柴火、鍋碗、米糧，扛起鐵鎬、板鏟，排成一百多里長

的隊伍，在五月的陽光下，走向黃河參加守堤的鬥爭；不少覺悟起來的農民，在這樣鬥爭的鍛鍊中，成了可歌可頌的英雄人物。“黃河英雄歌”、“水手王百連”不過是許多英雄形象中的一二個罷了。我看到被地主剝削、壓迫、侮辱過的婦女，都覺醒起來，參加了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鬥爭；我看到十八歲的姑娘，爲了她終身的幸福，向不合理的買賣婚姻作着殊死的鬥爭；我看到翻身農民認字，學文化，學習政策與鬥爭知識，成了黨的優秀的兒女；我看見五十多歲的老大娘，爲了支援人民解放軍，半夜裏做鞋、搗米，把手指磨出了鮮血；我看見成排的無數的車馬人羣，在護送糧草，支援劉、鄧百萬大軍迅速地渡過黃河，去殲滅殘害人民的蔣匪軍……這樣偉大的豐富的現實，激動着我的心靈，壯闊了我的思想，培育了我的感情，鼓舞着我的創作熱情。這使我後來寫成了“李秀貞傳歌”、“穆林女獻槍”、“春雲離婚”等詩篇。

在這期間，我認識了很多的說唱藝人，他們有着演唱的天才，驚人的記憶力，積累了幾十年的經驗，接受並發展了人民用智慧創造出來的說唱藝

術。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，工作在一起，他們的藝術才能深深地感動了我。當我聽到沈冠英同志自拉自唱地表演墜子的時候，許多羣衆聽得眉開眼笑，他的藝術力量立刻感染了觀衆，起到了良好的宣傳教育效果。從此，我以拜老師的決心向他們學習，記錄他們的唱詞，研究他們的唱腔，分析他們的表現手法，其中人民性最強、藝術性較高的是“打黃狼”、“百鳥朝鳳”等民間故事、寓言、傳說一類的段子。從這些說唱藝術中，使我認識了曲藝文學的特點，發現了它的精華，領會了它所以被人民熱愛的優秀傳統。這些人民的財富，口頭文學的表現技巧，對我的創作起了很深刻的影響，使我詩的風格有了進一步的發展。以後，我能够運用說唱詩的形式，改革舊說唱，給它以新的意義，並進一步用這種形式，反映現實中的人物、故事，都和那時的學習有着緊密的關聯。採用民間傳說的說唱形式，是爲了突破它的拘束，揚棄它的陳詞濫調，發揚它的優點，爲了更好地創造新詩的新風格。在我最近寫成的“張羽煮海”（唱詞，評劇）裏，我盡量地想往這方面來做。

一九四九年夏天，我來到人民的首都。這個美麗的、雄壯的古城，在黨的光輝照耀下年輕了，進步了，革新了。我愛它，我歌唱它，勝過愛我的家鄉，歌唱我的家鄉。人人都說，“居住在北京是幸福的，”我也感到了這種幸福，感到了作一個中國人的驕傲。四年來的生活，歷次的政治鬥爭，一步加深一步的學習，不斷地糾正了我的缺點與錯誤，提高了我的思想水平、藝術水平。不管工作多麼繁重，任務多麼艱巨，我從來不感到疲倦。親愛的黨，偉大的毛澤東同志，既然教育我為人民服務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，我是一個詩人，將永不放下自己的筆，我必須嚴肅而辛勤地創作。四年來，我寫成了“黃河英雄歌”、“穆林女獻槍”、“春雲離婚”、“第一支頌歌”、“李秀真傳歌”等五部詩集，雖說這些作品不好，但我已經盡了我創作的一分力量了。

二十年的創作生活，隨着中國社會的變革度過了。檢查一下自己的作品，實在貧弱得可憐。這裏所選的詩，大約佔我創作總量的十分之一。

這些作品，可以說是我的生活記錄，真實的歌唱，戰鬥的聲音，整個生命中所發射出來的一點火花。這些詩，我並不滿意，但我却很珍愛它。因為任何偉大的建築物，都是從最基層的磚石壘起的，已經寫成的詩就算我未來創作的基礎吧！經驗證明：只有在真實生活，戰鬥生活中才有詩；只有刻苦地向一切中外的先進藝術、民間藝術學習，努力改進、提高自己的藝術才能，才能寫出被廣大人民傳誦的詩。我和其他文藝界的同志一樣，正面臨着偉大的國家工業化、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期，不允許我停留，不允許在藝術上放鬆自己，我從心靈深處宣誓，為詩歌藝術的提高，為更好地反映今日的現實、明天的理想奮鬥到底！

1953年10月22日，北京。